

补说与解释：对伏羲与女娲关系的再讨论

陈向春

摘要：中国神话里的伏羲、女娲两神由分载到合记，由传说中的古帝，或氏族首领，到“粘合”为夫妇，成为阴阳二帝之神，其间经历过漫长的时间过程。这当中，两汉时期的一段演变，促成了两神传说，由虚变实，从抽象观念到具象灵祇。这一文化结果的产生，究其原因，与两汉时期特定的社会思潮有关。汉人根据先秦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弥散于社会上下的宗教信仰，以及充满神学色彩的帝王观念，最终将其改造成化育万物，阴阳匹配的神灵。

关键词：伏羲；女娲；汉代思潮；阴阳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6-0078-04

伏羲、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里的两位始祖。关于两者的关系，古来便有“兄弟说”、“兄妹说”与“夫妇说”三种。20世纪四十年代初，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①一文指出：“夫妇说见于记载最晚，因此在学者心目中也最可疑。直至近世，一些画像被发现和研究后，这说才稍得确定。”在此文中，闻先生按照现代人类学的原理，采用大量边疆和邻近民族的传说加以考证，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而这轮廓在文献中早被拆毁，它的复原是靠新兴的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努力才得以完成的。”^②这一说法，在此后有关的研究当中，被大多数学者所遵循。

从20世纪的八十年代末至今，国内神话学界对伏羲、女娲两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终在持续着。在这当中，出现了两个方面的质疑：

一是针对闻先生研究此问题的出发点、论证方法和结论进行所谓的“驳议”。认为“在60年后重读此文（指《伏羲考》笔者），不能不说它打上了太深的时代印记而在科学研究中误入甚多”；“研究和解释中国神话，无非是想从一个侧面搞清楚中国文化的构成，令人沮丧的是20世纪的中国神话研究却大大背离本土文化的主体精神，借用一些在我们引进时已经受到严峻挑战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

教条，撮合一些脱离语境的中国文献记载和来历不明的民间传说，通过各种形式的曲解，创造一些连神话原作者们也未曾梦见的奇谈怪论”。^③

二是质疑两神夫妇关系，以及成立的时间。已故的钟敬文先生在《评介一个苏联汉学家的神话研究》一文中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明确地说明伏羲与女娲两位神话人物的夫妇关系时间并不很早。有些被用以证明这种关系老早存在的文献，像王延寿所写《鲁灵光殿赋》里的‘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两句和东汉武梁祠石刻中的交尾像，都是值得怀疑的”；“关于伏羲、女娲夫妇关系成立时期的误解，清代学者对汉墓石刻图像的揣测已经开其端。从40年代闻一多的长文《伏羲考》发表之后，这种说法（指两汉时期）似乎被公认为定论了。……原始的伏羲女娲神话是各属于不同部落的，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阶段。他们的粘合在一起，是后来部族融合所带来的结果”。^④

对第一种质疑，驳议者以所谓“科学”的标尺来检视属于人文领域的神话研究；以所谓的“本土文化的主体精神”来非议闻一多等学者于60年前所开辟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和完全否定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可借鉴性，这是笔者难以苟同之点。20世纪九十年代末，傅璇琮先生针对当时学界围绕闻一多先生唐诗研究某些结论产生的争论，曾非常中肯地指出：“相隔60年以后，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前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拓他们的路程的，是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他们是怎样设计这段路面的？”

①闻一多《伏羲考》，《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②闻一多《伏羲考》，《神话与诗》，第2-3页。

收稿日期：2009-4-3

作者简介：陈向春（1952-），河北丰润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诗文化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古代诗学与唐宋文学。

③常金仓《伏羲女娲神话的历史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④钟敬文《评介一个苏联汉学家的神话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

这段路体现了创设者自身的什么样的思想风貌；我们对于先行者，仅仅做简单的比较，还是努力从那里得到一种开拓者的启示？”^①笔者以为，这才是真正“科学”的，因而也是可取的态度和领受。

对于第二种质疑，本文则认为，闻一多关于“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的结论是可信的。即使如钟敬文先生所说“他们的粘合在一起，是后来部族融合所带来的结果”，但二者到底还是被“粘合”了。问题的关键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他们何以被“粘合”？何时被“粘合”？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落上“结为”夫妇关系，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具有何种意义？在闻一多的《伏羲考》一文里，对两神“粘合”的时间，有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说明：“总观上揭所有的人首蛇身的图像与文字记载，考其年代，大致上起战国末叶，下至魏晋之间。……大概从西汉到东汉末是伏羲女娲在史乘上最烜赫的时期。到三国时，徐整的《三五历记》，盘古传说开始出现，伏羲的地位便开始低落了，所以我们拟定魏晋之间为这个传说终止活跃的年代。”^②闻先生此文的重点和用力之处是向更前一段时间追究传说发生的渊源，如其言“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在西汉初期既已成为建筑装饰的题材，则其传说渊源之古，可想而知。有了这种保证，我们不妨再向稍早的文献中探探它的消息”。^③故而未能就“最烜赫”的两汉时期，两神“粘合”的原因和涵义作明白的解释。有见于这一缺憾，本文将专门就此再作讨论，所有意见皆受闻说之启示，倘若能对闻说有所补足，则深为幸然。

关于伏羲、女娲在汉代文献里开始并提的情况，闻一多先生在其《伏羲考》一文里指出：“二人名字并见的例，则始于《淮南子》（《览冥训》）。他们在同书中又被称为二神（《精神训》笔者），或二皇（《原道训》、《谬称训》笔者）。不久，在纬书中（《尚书中侯》、《春秋元命苞》及《运斗枢》），我们便开始看见他们被列为三皇之首二皇。”^④这里所谓“二神”、“二皇”均为“阴阳”关系：

(1)“二神”。《淮南子·精神训》篇言及“二神”只有一处：“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芑漠阒，濛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此篇内未明言“二神”即为伏羲与女娲。东汉高诱注云：“二神，阴阳之神也。”也未明确提及。那么，闻先生何以断定此处“二神”即为伏羲、女娲“二人名字并见的例”呢？

(2)“二皇”。《淮南子》一书内，其《原道训》、《谬称训》两篇各有一处言及“二皇”。《原道训》篇云：“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谬

称训》篇云：“昔二皇，凤皇至于庭，三代至乎门，周室至于泽。”也未明言“二皇”就是伏羲、女娲。闻先生这一判断的根据，实出自对《览冥训》篇记载女娲一段文字的理解，可惜未能点破。从这段记载来看，闻说是成立的。应当指出的是：目前刊行的袁珂先生主编《中国神话萃编》一书将《览冥训》中这段关于女娲的记载，作了删节，附于女娲补天一节内，这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事实上，《览冥训》才是将伏羲与女娲合并记写的开始文献。这有文字为证：“昔者黄帝治天下……然犹未及虚戏（伏羲）氏之道也。往古之时……，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整段文字是从“然犹未及虚戏（伏羲）氏之道也”一句领起。《淮南子》追溯上古事，大多以伏羲之世为上限，这一情况与《绎史》引《帝王世纪》所说“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相吻合。汉人以伏羲为“二皇”之首的来由也端在于此。《览冥训》以记女娲事迹为主，是由于作者认为女娲体现了伏羲治世之道，记女娲即等于记伏羲。前引高诱注《览冥训》这段文字所云：“女娲，阴帝，佐虚戏治者也”，正表明了他对这段文字完整的理解。《淮南子》书的主旨依高诱序云“旨近老子”，此“伏羲之道”当为老子无为自然之道，以女娲事迹显示伏羲的功业，正所谓阳道尊而不动，阴道卑而佐勤。

以下再作文字比较。

(1)《精神训》篇云：“故未有天地之时……，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岛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阴阳之所壅沉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后者所为即前者之“经天营地”的注脚，以此判定所谓“二神”就是伏羲、女娲。

(2)《原道训》篇云：“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以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这里对“二皇之道”加以称赞，与《览冥训》中以女娲所为来体现“虚戏之道”的称颂之意如出一辙：“……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以此判定所谓“二皇”就是“继天而王”的伏羲与女娲。

自《览冥训》以后，后世文献屡现伏羲、女娲阴阳治世的记载，如《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以伏羲与女娲对举，将抽象的“阴阳”转变为神化的具体形象。李善注此文引《列子》书说“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有大圣之德”。距汉代不远，西晋葛洪《抱朴子·释滞》载：“女娲地出”，与东汉高诱注文所称“女

①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②闻一多《伏羲考》，《神话与诗》，第11-12页。

③闻一多《伏羲考》，《神话与诗》，第10页。

④闻一多《伏羲考》，《神话与诗》，第12页。

娲，阴帝”相呼应。此文称伏羲“继天而王”，“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反映的仍然是两汉阴阳“配合相包，阳禀阴受，雄雌相须”（东汉《周易参同契》语）的观念。又如《太平御览》卷78引《遁甲开山图》云：“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五气异色。次有柏皇氏……，凡十五代，皆袭庖牺之号”。《史记·补三皇本纪》（唐司马贞补）云：“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蛇身人首，有圣德。……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载，不承五运。”所谓“无革造”即指“袭庖牺之号”，不独称号，以明与伏羲并治之意。

在汉墓壁画、画像砖石中，伏羲手捧太阳，女娲则手捧月亮，此图像宣示的即是“阴阳”二神。据1942年出土的《楚帛书甲篇》^①：“曰故(古)因熊包戏(伏羲)，出自口震(震)，居于睢口。厥口倏倏，口口口女。梦梦墨墨，亡章弼弼。圃(晦)水口，风雨是於。乃取(娶)口口子之子，曰女媧(媧)，是生子四。口是襄而戔，是各(格)参化法逆(度)。”大意谓：“在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大地，这是他们懂得阴阳参化法则的缘故。”^②这一描述十分接近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精神训》，此篇云：“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芑漠阒，濛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对照《楚帛书甲篇》，《精神训》篇里的“二神”指伏羲、女娲当无疑义。

那么，两神夫妇关系何以特别在两汉时期形成呢？这自然是由多种元素促成，这里特别提出与汉代文化思潮相关的两点。首先是由于这一时期盛行的天数变化观念的作用使然。《易传·系辞》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以单数代表天的变化。汉《京房易传》明确地说：“一、三、五、七、九，阳之数也”。《易传》对代表阳数的乾卦特别尊崇，称之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三国时期徐整的《三五历纪》在总括天地开辟与定位的过程说：“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即以单数象征自盘古诞生到天地定位的变化过程。在历史记载中盘古之所以被视为“天

地万物之祖”、“初天皇氏”，都与这种天数变化的观念有关。既然代表阳数的神被创造出来，再按阴阳关系配对是极为自然的事。于是，在汉代便连续产生女娲配伏羲、西王母配东王公，以及盘古传说流传过程中有盘古夫妇的附会，这些均暗示着同一种数理观念，从而使传说与哲学挂钩，最终得到“合理化”的成果。这清楚地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伏羲女娲故事演变至两汉时期，最先开始脱离纯粹的“神话”状态，演变为神化形象，实与时代观念有关，而在两汉时代，不论是壁画、画像砖石，抑或文字传写，弥散着汉代思潮特有的气息。两汉文献的屡屡记载，从实质上说，是展示和印证了这一观念“催生”时代神祇的历史过程。

其次，两神为夫妇，乃汉人精神世界里的宗教信仰使然。成书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有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在此话语当中，“位”尚是虚的，处于观念形态。但在两汉长期的“阴阳化生”以及神学思潮的推动之下，虚转化为实了。《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文：“女娲、阴帝、佐虞戏（伏羲）治者也”，以女娲为阴帝，相对的伏羲，便是阳帝。这透露了至少在高诱的东汉时期，两神作为阴阳相佐的一对配偶神灵，受到广泛的膜拜。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说：“夫为阳，妇为阴。”《白虎通》卷9引《易传》说：“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在汉人观念里，伏羲和女娲作为天地开辟之后的人类始祖神，其至德即在“承天地施阴阳”以化育万物。如东汉许慎《说文》释“媧”而云“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古微书》卷12引《春秋内事》称伏羲“自开辟后，五纬各居其方。至伏羲乃有消息祸福，以制吉凶，始合之以为元。”战国末期的《易传》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于伏羲与《易传》的关系和作为最古的王，又由于女娲自古以来一直被人们视为化育万物的伟大母亲，遂使汉人有可能依据“阴阳化生”观念将其“粘合”成一对夫妇，用以解释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如果考虑到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天人感应与谶纬神学盛行的社会背景，考虑到当时儒家学者广泛利用上古传说，兼取先秦诸子思想，包括《易传》，以构造其神学化的治世学说，那么，汉人的这一附会，乃至“粘合”实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果。高诱注文很清楚地表明：经汉人“粘合”以后，伏羲、女娲作为创生万物的一对始祖，分别成了天地（乾坤、阴阳）的代表，以此被视为阴阳二帝，在世间受到顶礼膜拜。

余论：与给《淮南子》作注的高诱同时代的王充，在其《论衡·顺鼓篇》中，有这样一段特殊的答问：“雨不霁，祭女娲，于礼何见？伏羲、女娲俱圣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下转第58页）

①长沙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出土地点是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王家祖山一座楚墓。据1973年对该墓葬发掘的报告判定，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之交，帛书写作年代当与此相同或稍早。此处释文据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的若干问题》一文，见《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②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的若干问题》。

这样的整理，不淹没前人辑佚的成就，又体现一切追溯最可考文献的现代学术理念，无疑是值得我们参酌的。

近年古籍数码化工作的普及推广，引起一些学者对于传统学术当代命运的重新思考，一些极端的说法，认为古籍辑佚学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所见有些道理。以往的古籍辑佚学家，一般都是在广览群书时记录佚文，逐渐集腋成裘，得以成编。古籍全文检索实现后，上万种古籍中引到哪些典籍，似乎只要将书名输入，瞬间即可得到大量线索，无劳日积月累的辛苦，更不用皓首穷经地苦读，一切都变得如此轻快惬意。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古籍数码化提供了古籍全面检索的极大便利，无疑可以带来文史研究的革命性变化，一些倚靠文本积累的基本文献工作，得益尤大。比如汉语词汇研究，以往的学者都有许多装卡片的小抽斗，记录多少年来读书中搜集到的语例，但现在利用电脑，一搜就可以得到成百上千的语例。再如研究古代语法，那种句型何时出现，也较难明确判断，现在一些具有高级搜索功能的语料库也可以给予解决。古籍数码化的实现，为学者省

去了许多劳累，也要求学者不应仅满足基本语例的积累，而应该在新的探究学术课题。就古籍辑佚学来说，情况也一样。

我觉得，要达到梁启超所述古籍辑本优秀的标准，学者大约要经历文献收集、校订、鉴别、编次四道工序。古籍数码化提供了第一步文献收集的方便，但仅此一步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检索完成。因为同一书的佚文，在各书中称引时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名称，甚至不提书名而可以判断出自某书，这些都需要学者以敏锐的感觉来加以判断。至于校订、鉴别、编次，更需要学者以很大的耐心来做出处理。因此，我认为古籍数码化为现代学者从事古籍辑佚提供了新的难得的机遇，我们可以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遵循现代学术的规范，开创超过前代的成就。就我近年所见古籍辑佚书的成就来说，如尚志钧辑录唐宋本草书那样，利用现存文献，能将一系列已经失传的古本草书大体恢复原编，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值得对各个学科古籍有兴趣辑录的学者参考。

以上所谈，不知广超赞同否。

The Development Chance of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in Digitalization Time----the Preface of Shi Guangchao's *Yongle Dadian Jiyi Shugao* CHEN Shang-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Fudan University 200433)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preface of *Yongle Dadian Jiyi Shugao* (永乐大典辑佚述稿) by Dr. Shi Guangchao. It mainly deals with the points of Shi's book, its goal and finds. Then, this article retrospects achievements and lessons we have gained in the field of collection. It also claims that the digita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provides new chances and enables us to move further in this field while sticking to today's academic criteria.

Key words: collection of ancient books; digita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Shi Guangchao; collection of *Yongle Dadian* (责任编辑: 石磊)

(上接第 80 页)

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这是说，董仲舒曾讲过，淫雨不止，就祭女娲。这是《春秋》里没有的话。伏羲、女娲都是圣者，为什么单要祭女娲呢？对此，王充回答说：虽然两者都是圣者，但伏羲是男，主阳，女娲是女，主阴。雨不停止，是阴气作怪，所以祭女娲求她福佑。从这则史料看，一是汉代图画女娲之像在汉代民间的存在极为普遍。以今天可见的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证之，再联系王充所谓“男阳而女阴”的解释，两神当是并图，已明其为夫妇关系。二是文献中伏羲、女娲两神常常并提的情况，在董仲舒的西汉时期就已出现，其原因在于汉人是从阴阳交感、化生万物这一观念出发，去看待这两位古老传说中的始祖。这反映出上古神话在汉代不仅表现出神话——历史化的趋势，也表现出神话——观念化的特征。像这一类的改造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

Rescan the Relation between Fu Xi and Nu Wa CHEN Xiang-ch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two deities Fu Xi and Nu Wa in Chinese mythology were considered as a couple at the first. The independent relation between them had been transformed in many centuries. In Han dynasty people interpreted the two deities with political and theological science, Yin-Yang and Wu-Xing were used to explaining the way in which the world was created by Fu Xi and Nu Wa whom were had been expounded to be a couple.

Key words: Fu Xi; Nu Wa; Philosophy Trend in Han dynasty; Yin-Yang

(责任编辑: 陈剑)